

文 革 博 物 馆 专 集 (五 十 八)

年复一年，日全蚀又发生了。与研究所同事观看完毕，回到办公室，一眼看到《华夏文摘增刊》一六二期上登的上官云珠女儿写的文章“……我的叔叔程述铭……”

…1971年深秋，在天文台被隔离关押时，……触电自杀。”上一次日全蚀后发生的灾难一下子又涌到眼前。

◇ 由日全蚀观测而引出的“叛国集团”案

七十年代初，科学院与全国一样在“运动”中，很少有人过问业务。明知将在新疆地区发生日全蚀，也没有人敢说去观测。说太阳有黑子就有被打成反革命的危险，谁还敢说红太阳会被遮掩掉？或许正因为如此，居心叵测的“林副统帅”提出科学院应去观测。各天文台马上热闹起来。上海台也不例外，想通过恒星视位置的变化再次验证爱因斯坦相对论。但日全蚀时刻已近日落。粗略一算就知观测精度不能满足要求。我们决定不去。眼看紫金山天文台、北京天文台同行去，而我们却放弃了新疆一游，心里痒痒的。谁知羊肉没吃上，羊膻却被染上身。

事情是这么发生的。观测点选在离边境不远的喀什附近。据说有位紫台同行画了一地形草图，标上解放军边防站位置等，以备意外之需，如迷路、急病等。如果有人急病，当然找解放军驻点最合适。不料工宣队却另有想法。他们阶级觉悟和警惕性特别高，一下子就把这张地形草图与叛逃出国拉上关系。于是，马上开始隔离审查，开始逼供信。那位同行被迫屈招。接着是“政策攻心”，揭发同伙，戴罪立功。雪球就这样开始滚起来。一批人被抓起来，再揭发另一批。不仅揭发同事，还要揭发同学，朋友。不但是去新疆的人，还可以是不去的人。一个“叛国集团”开始在工宣队的脑子里和材料柜里成形。在紫台工作的一位中学同学把我也卷了进来。

自然，滚雪球也需时间。滚到我，日全蚀已经过去很久了。而在这一段时间，我自己却对此毫无察觉。

◇ 关进“牛棚”

七一年六月四日，党领导丁××把我叫去。“你有什么要交待的？”我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没有什么要交待的。怎么回事呀？”丁××先是露出凶相，接着是狡黠的得意。“好吧，你不愿意在这里交待，我们有地方让你去交待。”我就这样不明不白地被关进了佘山的“牛棚”。后来，为集中管理牛鬼蛇神方便，又把我转押到天文台徐家汇本部。

在徐家汇，我被关在原来的中星仪观测室。位于中部的一大间住着“牛倌”。左边小间为训话室。右面有二小间，其门都通向大间。我关在最右一间。门上有大铁锁反锁着，窗口有加固铁条。除了被拉出去批斗，或在观测室门前泥地上种菜之外，平时就被锁在房里。房内提供一个痰盂（用途大家都知道），每日清倒一次。又令我在观测室左侧紧靠区委墙边挖个坑，再支一张破芦席，这便是我的“专厕”。一日三餐“用不着”去食堂，有人送进棚来（也真够辛苦他们的）。饭几两自己说，菜不可挑。每隔数月剪发一次，以便批斗时雅观一些，并作为他们“讲政策”的明证。当然，剪发也是用不着离开牛棚的。

工、军宣队及党领导在上面指挥。下面看牛的全是同事。称其为牛倌并无恶意，只为了书写简洁。毕竟是知识分子单位，重文攻轻武斗。除了批斗时按头，或推推搡搡，而暗中又可能被捅几拳外，倒并未受到更多的皮肉之苦。当然，正因为是知识分子单位，心计之多也可想象。白天不时有人突然或悄然闯进棚来，以便看我到底在干什么；半夜，他们又常用手电筒直射我的眼睛，及至把我惊醒，就问我要什么“坦白”的。各种各样的攻心战，诱逼我供认的花招不胜其数。

开头，不允许我通信。隔离了几个月后，才解除禁令。但信件都要经过审查。

写出去的信，检查出不“合适”的字句，就要删去重写。给我的信也要审查。不宜给我看的，没收。不论是写出去的信，还是能给我看的来信，都由牛倌抄录一分，连同没收的来信，一起存档。存档的目的是清楚的。这样他们可以随时翻阅，以便找出罪证或线索来。（当时没有复印机。自然，也劳累了这些牛倌们。）

◇ 当上了“叛国集团”上海地区的“头头”

除了听工宣队训话以外，在牛棚的日常生活就是白天劳动，晚上写交待。劳动干什么，有人布置。“交待”什么，工宣队的说法和丁××一样，“你自己应该知道”。当时全国在抓“五一六”分子。我以为他们是把我当成“五一六”分子抓进来的。对此我完全没什么可以交待的。于是就写“情况说明”反复表明我与“五一六”无关。这样写了个把月，工、军宣队就渐渐向我抛材料，点出“叛国投敌”问题，要我交待。听说我竟涉嫌于叛国投敌，惊吓不小。但接着就反而平静了。心想这不象什么思想问题之类，说有说无，分辨不清。这种大事，绝对冤枉，也绝对可以讲清楚。于是继续写新的情况说明。然而我太天真了。他们要的不是事实或情况，他们要的是罪行，严重的、耸人听闻的罪行。因为罪行越严重，他们向上报告起来功劳就越大。

上海台有四人因叛国案而被隔离。其中三位隔离不久后就“坦白、交待”了。据说一位在交待中，从紫阳路天主堂到气象局天文台宿舍短短几百米路上可以有许多事情发生。与C I A怎样联络等等。如果这些交待材料集成册，必是一本极精彩的惊险小说。还有怎样策划偷解放军的枪支之类。工、军宣队见我不坦白，“最不老实”，就启发、诱导他们揭发我。顷刻间我便成了叛国集团上海地区的头头。他们犯的罪当然也就是我的罪。工、军宣队越加得意了。毕竟他们找到了首犯。政策攻心之计收获巨大。

工、军宣队见我的罪证已被他们抓到，就开门见山向我抛来：“你×月×日去南京策划叛逃计划，具体与谁接触，谈些什么，计划是什么？”“你们是怎样与C I A联系的？”还要揭发C I A的联络人。我提出许多人证物证，证明我那天还在上海台上班。根本没去南京，何以谈得上与紫台的人一起策谋。至于“与C I A联系”我根本不知道，“更何况逃到苏联去找C I A是找错人了，要找K G B才对。”我还说，非但我没有叛国，我敢断定其他人也是假交待。这样假来假去领导不好收场。照上海人说法，我这些话是十三点。比十三点还要十三点。工、军宣队听了大发雷霆，臭骂我顽固不化、死路一条。他们怎么会考虑将来收场。他们只盼眼下早日往上爬，哪怕整死你也无所谓。不是吗？工宣队长传说就要去哪个国家当外交官了。顾××更是穷凶极恶，急切期待从我们身上踏上去，爬个什么官帽子来。

对我的压力越来越大了，攻心更频繁。有一天他们得意地告诉我：“你的北京天文台同伙已被公安局抓走。”（我不认识这位“同伙”。只是我后来听说，此人被审急了，突然冒出一句“是毛泽东让你们这样干的吗？”，这样就被抓了。）“如果你在这个学习班里不好好交待，我们也可以送你到公安局去。”此后我多次被牛倌们押着去文化广场等处参加市级大牛鬼蛇神的批斗会。批完后，他们被穿公安服装的人押走。牛倌指着说：“下一个就轮到你了。”后来，在劳动时果然看见有几个穿黄色军装（或公安服装）模样的人在天文台大院里走动。不知是真是假。牛倌们还故意指指点点，企图引起我的注意。我想可能真的要被送进公安局了，把一小包衣着之类整理好，免得临时慌乱。

尽管作了准备，我心里还是一阵又一阵抽紧。盘算着将来的出路，无非三种可能：最坏的是像他们讲的吃枪毙；其次大牢数年或无期；最轻的是就地劳改。“态度”再好些或能换顶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帽子。而我确实没有什么东西可交待，“态度”自然就好不起来。不论哪种结果，家属、亲人都要受牵连，背恶

名。我真对不起大家啊，但我又能怎么办呢？也去假交待？不！绝对不能搞这种事！你一走上这一步，他们就要逼着你去揭发别人。自己就是这样被人害了的，我能再去害别人吗？具体说来，天文台有不少同事与我关系密切，还有武汉测绘学院的老校友。在我受审查的那些日子里，他们也受到很大压力。他们与我的“黑关系”已经被人揭发。只要我一胡说，他们一定遭殃。于是横下一条心，无非自己多吃点苦头，让那个雪球滚到我这里为止。我默默地祈求众亲友的原谅，允许我继续这么“顽固不化”下去。我也确信，我这样做即使给自己和家人带来更大的损失，我的亲人也是不会怨我的。甚至我更相信，如果我瞎说、害人，我的父母就会不要这个儿子，我的妻子就会对我怒目相视，我的孩子长大后，也不会原谅我给她留下的耻辱。事实上，我能挺下去，全靠家里这个坚强的后盾。

◇ 妻子和女儿

我刚进牛棚时，妻子预产期还有一个月。隔离后家里什么消息也没有了。在近产期的那段日子里，气温极高。想想妻子在这种时候生孩子真不容易，真希望天下雨，可以凉爽些。真想听到一些家里的消息啊！工宣队顾××果然给我带来了消息。“你爱人生产了。如果你现在马上坦白交待还来得及，我们可以让你去医院看她。”我做爸爸了！一瞬间的兴奋立即被悲哀的现实所取代。别人家妻子生孩子都有丈夫去探望，抱抱孩子，带吃的东西去了。唯有我的妻，就象丈夫不存在似的。我愤怒了。我对妻子和孩子的感情竟也被他们利用来作为要挟我的手段！我何不想去看看她们母女俩？但我不能为此而上他们的当。

一计不成，再来一计。妻子满月不久，工、军宣队让姐姐和妻子来探望我，让她们来劝我交待。事先与她们说好，除了这个，别的不许讲。几个月来第一次见到亲人，心中五味俱全。强迫自己不流下眼泪。军宣队那位骨溜溜地看着我妻，说：“朱圣源与你结婚是玩弄女性。自己明明要逃到外国，还结什么婚。”说毕，那贼眼又盯着她。家里只说“你要实事求是，有什么就说什么”。工、军宣队当着家属面客客气气对我作一番开导，接着轮到我表态。我立即抓紧机会说：“我没做什么坏事，你们放心。”这是我等待了几个月一直想向家里说而没有机会说的一句话。我庆幸自己能得到并把握了这个机会。没等我再张口就立即被赶回牛棚。在牛棚里，听到那位自知失策、气急败坏的顾××的破口大骂。

◇ 程述铭先生

再过一段时间后，从牛馆谈话中听说程述铭也被隔离批判。罪名：解放前参加反苏游行。苏联老大哥呀，你真让咱中国人受罪了：反对你的成了反革命，喜欢你的成了反革命，既不喜欢也没有反对的人，也可以被栽上一个反对你或喜欢你的罪名而被打成反革命！记得高中毕业那年搞大鸣大放，人人必须放。我随便写了一张“苏联帮助中国是无私的吗”的大字报，指出双方是互利的。竟然也成了反党之罪，被记入档案。幸亏当时中学生不划右派，免遭大难。

程先生开始时被关在研究室楼里。后来突然被转移到了我的隔壁。他来的当天晚上，那位军宣队及程先生所在研究室的党领导，牛馆刘××就来对他攻心。照理训话都在最左边那间训话室，隔音好。但这次偏偏就在他的小房间里。有时声音还特别大：“你再顽抗下去就要象朱圣源一样死路一条。”“当然，尽管朱圣源罪行十分严重，只要他现在还肯坦白交待，我们还是会给他出路的。”这都是那牛馆的话。显然这拙劣的攻心计是對我来的。就在那个晚上程先生选择了士可杀而不可侮的对抗方式。

第二天早上只听见观测室前乱哄哄的。我的窗口被遮起来，不许张望。更不许出去。大小便都只能用那个痰盂。这样持续了大半天，才算“解除警报”。从此以

后没有听到程的声音或者训斥他的声音。我猜想莫非是他半夜逃走，从而引起牛信们的惊慌？过几天后新来一位外号“泥鳅”的叛国案同犯。在一起劳动时，他偷偷告诉我，他住我隔壁，晚上睡觉很害怕，因为程先生死在那儿。这才知道程先生自杀了。详情不得而知；自杀方式，有人告诉我是上吊。当事人从来就没有敢公开过事实真相。从《华夏文摘》上我第一次得知程先生是触电身亡。程先生的事，至今还没听说过平反。我知道的只是，那位牛信现在已升到更高的职位上了。

◇ “泥鳅”

由于当局严密封锁事实真相，不实的消息就到处流传。那位“泥鳅”告诉我，有消息说自杀的是我。有一位揭发过我的人，因此而自责而痛哭。对于这些人，其实我并无过多的责备。他们也是被迫而为。实不忍心视之为罪恶。

然而，从“泥鳅”身上，我又看到了罪恶。“泥鳅”善言谈。他告诉我，工宣队要他揭发台内一位女同事与叛国集团有关。因为与这位女同事关系甚好，他挺住了没有揭发。我说他还有良心。他也告诉我，他揭发过许多老同学同事。我说，你瞎咬别人，害得别人一家老小受那么多苦难，自己到底能得到什么呢？不过从工宣队口中讨一句“态度好”吧。但你最终逃脱不了良心的谴责，和那位揭发我的人一样。这样做人又有多大意思？从“泥鳅”那儿得知我们两个房间之间不过板墙相隔，而且板中间还有缝。我深恨自己没有早注意到这个事实。如果知道那天晚上我就可能偷偷看一眼程先生，或者还能阻止程先生的……。唉，太晚了！“泥鳅”从墙缝里塞过来一张纸条，问我他该不该收回他的假交待。还让看完后立即撕掉。我真把条子销毁了，并回了一张纸条，说没有做的事要敢于说没有。

没多久，我俩又被拖出去批斗。先批“泥鳅”，我站在边上像是陪斗。“你为什么要翻案？”“打倒×××”……他回答“我该死，我是叛国集团成员，翻案是罪上加罪”。接着话锋一转，马上揭发，叫他翻案的就是站在旁边的我——叛国集团上海地区的头头。工宣队马上拿出一张纸条，是我写的。白纸黑字，罪责难逃。我才知道上了他们的当。当即大声反驳，说我只叫他实事求是，没叫他翻案。我还说，我确信这个叛国集团是造出来的……没等我说完，立即被按下了头，封住了咀。背上也被捅了好几下。

“泥鳅”立了一大功后，不久被从宽处理了：白天劳动，晚上自由。其他几位也陆续被这样处理。唯我这个死顽固又被多关了几个月。

春节快来临，牛信们也要回家过年。72年2月8日晚，正准备睡觉，牛信进来通知我：可以滚回家了。

◇ “牛棚”，三年多的监督劳动生活

回到家里，大家抱头痛哭一场。父母明显苍老许多。妻子瘦弱、无神。女儿从出生到我第一次回家七个月左右，体重几乎没有增加。自进牛棚以来，父母天天担忧，妻子天天哭泣，身、心受了多少创伤。父亲的早逝也与此不无相关。母亲、妻子、女儿身上至今还看得出当时心理上留下的伤痕。这个债谁来还？

滚回家了，并不等于就没事了。接下来就是三年多的监督劳动生活。清早别人上班前一、二个小时要到，晚上八点来钟才能离开。主职：扫厕所；兼职：扫院子，修路，刷墙。各种别人不愿干的苦活、重活都干过。发烧39度，医生开病假。顾××回答：39度算什么，不准假，照样洗刷马桶。后来找了个合法机会，请假去市革命委员会第三办公室（专管科学院等单位），告天文台工宣队不讲政策。三办当然也是工宣队领导的，穿一条裤子。马上就传给天文台工宣队。顾××说“像

你这样不老实，只有从严处理”。“我宁可从严处理。你们为什么把我挂着不处理？有什么罪你们就快处理吧。”拿不出我罪证的顾气得结结巴巴不知说什么好。“难道你的所作所为都符合毛泽东思想？”“难道你自己作的一切都符合毛泽东思想？难道一个人某些方面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就要关八个月，就要天天扫厕所？”接下去他那骂人的话就不好写下去了。

很久以后，才偶然听到，紫台叛国集团案早就翻案。总根子不存在了，上海部份这些枝枝叶叶也失去依据。正是这个缘故，公安局才没有把我收入大牢。也正因为如此，春节前把我放回家。但为什么仍要我继续受审查，监督劳动扫厕所三年多？道理很简单：领导是永远不会错的。叛国集团不存在，叛国思想总还是可以有的嘛。那几位牛不是都交待了叛国思想吗？工宣队真讲政策，真会“去伪存真”。他们把捏造的“叛国行为”去掉，而把交待中的叛国思想都存下来，作为铁案不许翻。你想翻也拿不出证据，给脑子拍X光片子能行吗？而对他们来说，查出了叛国思想则是一个很大的功劳（整个文化大革命还有比这更大的功劳吗？），是他们向上爬的资本。所以我仍被抓住不放。

◇ 天文望远镜和水晶棺材，几乎又闯大祸

天文台大望远镜设计组缺人搞计算，向工宣队请求要我去帮忙。工宣队没法拒绝，但明确要求他们要好好监督我。这样，三年多的扫厕所生涯到此结束，但监督审查的状态远远还看不到头。当然，设计组里大家对我很好，从来不把我当罪犯。至今我仍抱着感激之心。

“老人家”逝世后的一个晚上，天文台党领导和望远镜组同事来我家，要我马上去执行一个“光荣任务”。上海市委领导要在上海为老人家做水晶棺材。造望远镜镜片的新沪玻璃厂负责制造，要我参加设计计算。我当即拒绝。望远镜镜片和水晶棺材虽同用高级玻璃为材料，但光学和力学性能要求完全不同。经组里同事一再恳邀，心想不能忘了别人对我的好处，就答应了，带着穿孔纸带到交通大学去上机。也不见有人来要计算结果。最后棺材由北京造了。似乎事已不了了之。谁知过不久从交大传来消息，说有专案组到交大追查，哪个人胆大包天算这个玩意儿，明明在与北京中央领导对抗。这下可又闯祸了。追究起来，每个人都要找替罪羊。而这个替罪羊的最佳候选人，自然只能是我了。幸好，四人帮下台，我这场新灾就免去了。

◇ 工宣队光荣撤离，“叛国”案不了了之

工宣队要光荣撤走。撤离前还要欢送。他们走时，对叛国集团案连提都不敢提。只是客客气气说，有些事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是的，他们没错，都是我们自己不好。谁让你惹来个事出有因，还让别人辛辛苦苦调查一大阵？总算查出是没有实据的，我们还得感谢人家了。见到我，说了一句“不过请你到学习班学习学习而已”。领导一朝换一朝，反正没有听说过有什么一朝为前一朝去负什么责任的。一直到今天，还没有正式地、爽爽快快地直截了当地为“叛国集团案”宣布平反。只是间接地、不痛不痒地说了句“当时做法是不对的”。不管怎样，从此没有人再找我的麻烦了。这大概就是“被解放了”的意思吧。

◇ 灵魂的检阅

很多人说，文化革命如一场戏。也可以说是一场灵魂的大检阅。就大多数人而言，其灵魂既具有善的一面，又具有恶的一面。不论是哪一面，在这场检阅都得到了充份的表现。

就牛棚而论，有审查的和被审查的。被审查的人中，绝大多数都是无辜的。这些无辜的人，灵魂中也有善恶两面。在特殊的被审查的环境中，有些人恶的一面被诱发出来，就乱咬人。你也不能全怪他们，因为这个审查本身就是恶。所以，除了象“泥鳅”那样伙同作恶的以外，我都不去怨恨他们，忘记了事。其中有些人至今仍是好朋友。

审查一方，工、军宣队，牛馆中的人，也各不相同。有几位老师傅态度和气，从不故意刁难人。无非是随大流，应付差使，说几句官话。有一位竟然还说，要好好交待，但要讲实话，不要乱说。牛馆中也不过二、三人时常作恶而已。一人为此立功而“火线入党”。另外的已经是党员，也因整我们有功而受重用。监督员中也有踏着我们往上爬的，以对我们的凶恶来讨工、军宣队的好。也有十分友善，而且很照顾我的。那位电工和他的徒弟对我的关照，我一直记在心里。

人有德于我，不可忘之。这是古训。我常常怀念那些在黑暗日子里对我好的人。除了前面讲的，特别值得提到的是我妻子在上海无线电八厂工作的女同事李女士。她的丈夫也是高干，但他们不怕“叛国犯”染黑他们的家。还在我监督劳动扫厕所时期，就常在周末请我们去吃饭，安慰我们。

当然最重要的精神支柱是我妻。她忍受极大的精神压力，没有一丝抱怨，一直理解我、支持我，还陪同我各方奔走申诉。家里的亲人，特别是父母给了我无穷的力量。正是他们，鼓励我勇敢地活下去，顶住那可怕的恐吓和巨大的压力。

◇ 尾声

四人帮倒台，全国舆论转向，我的处境开始变化。

许多同事说我顶住了，有骨气，对我表示信任和友好。于是在关于什么“梯队”、“接班人”的讨论中，都常提到我的名字。

北京芭蕾舞团一位导演和几位演员，也专程到上海找我几次，说要演出我的“不屈不挠的事迹”。甚至谈了许多表演细节，并说首演要请我去看。后来上面大领导不支持搞“文革文艺”，此事即作罢论。

直到86年第二次出国前，还有记者来采访，拍照。我表弟还告诉我，他听到了电台广播里介绍我的事迹。

这些事情，我都没有兴趣。“接班人”，我不是那块料。我只想在所学的专业里作点事情。报纸、电台的宣传，我也厌了。以前整我，今天又要把我抬起来。我怕的是下一次要摔得更疼。自然，我很同情那几位艺术家，他们又白忙了一趟。

我选择了在国外定居、谋生，因为在这里我可以获得较为合适的进行科学研究的条件。和多数在国外谋生的学者一样，我不能忘记我的民族，我的父母、亲人和朋友。因此我每年都要回国探亲。在因文革而过早辞世的父亲的坟头培一把土；陪着年迈的母亲默默地坐几个小时，听她老人家回忆各种往事。也和亲戚、朋友们交谈，其中包括当时揭发过我的人。

通过这些接触和交谈，我体会到，我们的民族灾难深沉。要摆脱这个灾难，必须找到一条至少可以避免象文革这样的闹剧重演的道路。所以我确信巴金老人的建议的意义，支持文革博物馆的建立。我并不指望我这一段回忆能够成为文革博物馆的哪怕是放在某个最不引人注目的角落里的收藏品，但愿它能为促成这个博物馆的建立而尽微薄助力。

□ 1999年9月8日于德国波茨坦

∞ ∞ ∞ ∞ ∞ ∞ ∞ ∞ ∞ ∞ ∞

搞原子弹的科学家

• 冯骥才 •

1968年 37岁 男 Q省某地核试验某研究室主任

我有一个要求，请你不要把我的经历，当作一个猎奇的故事。我不愿意，以我遭受的坎坷、不幸和苦痛，满足人们的好奇心。我渴望人们从中了解中国知识分子心灵深处是怎么回事。因为，我的成长和创伤，不仅属于我个人，大致也代表我们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历程。

造出原子弹来，并不像有些人想象得那么神秘。不是几个尖端科学家在屋里想出来的。当然，要有科学家们提出理论依据和设计方案，但要把它从无到有，实实在在制造出来，需要许许多多人的献身拼搏，艰苦创业，反复实验，来把它最终实现。这是千千万万知识分子、技术工人、战士，还有组织者们用脑子、用智慧、用手、用汗水、用生命，创造出来的。我仅仅是其中的一个，是在基地第一线搞攻关、搞科研和实验工作的。基地设在大西北，一想到金银滩的大草原，一望无际，那时真是难以描述的荒凉和艰苦啊！

我出身书香门第，中学时代参加了学生运动并加入了地下党，解放后进了大学。大学毕业后就被派到苏联进修——我不谈技术方面的东西，太复杂，你也很难写清楚，只谈命运吧——六〇年初，组织上对我说，有个极其重要的国防科研任务派你去。这就是搞原子弹。原先我们希望苏联提供这方面技术，五九年中苏关系出现裂痕，苏联单方面撤回协议，没希望了，就决定自己干。自己干谈何容易，白手起家，又是这么高精尖的东西。任务压给二机部，后来叫核工业部。这任务在当时是绝对机密的，内部代号叫596。是指五九年六月，苏联单方面撤回协议，拒绝提供技术资料这日期。把这日子作为任务代号，就是激励大家争口气，不依赖任何人，别人造得出来，我们自己也非造出来不可。最初，像我这样不到三十岁年纪的科研人员参加进来，仅仅有几个，都是严格挑选，政治和业务很可靠的。这是组织上的绝对信任，自己当然也有种光荣感了，而光荣感化作一种激情，灼热地填满我年轻的胸膛。

脚踏金银滩，满目荒凉。这里原是老藏民族放牦牛的地方。牧草很丰盛，草原上还有野花和鲜美的蘑菇，但除去这些什么都没有了。没有路，没有房子，没有树，只有太阳、月亮、大风、霜雪和酷冷。对了，还有狼。人们像开荒那样，最初都住在帐篷里，天天夜里听风吼狼嚎。海拔三千米，缺氧，走路急了喘不过气，胸膛憋得像灌满砂子；干活很容易累，喉咙像塞了塞子。气压低得馒头都蒸不熟。这里一铁一木，一砖一瓦，以及日用的一切，包括一盒火柴都得从很远处运来，又正赶上“三年困难时期”，物资缺乏，运输跟不上。生活谈不上半点特殊化，材料仪器都是缺这少那。多难！但我们站在这三千米高原上，满怀豪情，决心就在这儿把显示中国人志气的蘑菇云升起来。当时我们最爱说一句话，叫作“空气动力学”。这是物理学的一个名词，借用过来的意思是把“气”作为“动力”。我们肚子憋一口气，就是动力。国家强盛就是我们的人生目标。虽然身在茫茫金银滩，两手空空，连一个原子弹零件也没有。反正一来到这里，一辈子就交给它了。当时我们的想法就这么简单！现在年轻人可能会讥笑我们是“愚忠的一代”，“驯服的一代”，可我们当时活得那么充实！

来到草原，我们马上投入紧张工作。先是做缩小尺寸的爆轰试验，用的是模拟

材料，代用品，不是真的材料，看它的合理性怎么样，与指标符不符合，其它动作过程也完全一样，要看它是不是满足设计要求。我领导一个组，都是实验科研人员。每次试验都要花费巨额的钱，测量数据不出来就白实验了，所以工作责任大，价值很高，一点粗心大意也不行；必须全神贯注，全心贯注。我常对大家说，实验用的电缆是我们的生命线，真把原子弹看得比自己生命还要重。基础工作扎实，任何细节都一丝不苟，这是中国原子弹为什么这么快就试验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缩小尺寸的模型试验于一九六三年就成功了。六四年又重复成功，当年就做全尺寸的爆裂试验，意思是尺寸和正式原子弹1：1，一样大，除了装料不是活性材料，其它都是用原子弹的材料和结构。这次试验关系重大，不成功就谈不上下边的核试验，它的成败紧紧抓住整个基地上所有人的心！我们更是紧张，住在基地分厂的工号里做准备，我负责实验测量，一连几天几夜反复检查每台仪器，每个接点，每条缆线，还要做模拟操作，我们叫“预演”，生怕正式“开场演出”时出差错。半点差错就全报废！那几天，我时时都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

这次试验效果非常好。试验一完，我就赶紧把记录的相片底片，用车送回厂部，马上冲洗出来，接着捏着这底片恨不得一步跨进总指挥部。领导们都在那里等着呢。有总指挥，还有从北京赶来的负责人。当我急匆匆进屋时，满屋领导都一声不响，所有眼睛都盯住我，静极了。我好像也听见他们的心跳声，我举起底片给大家看，说：“试验成功了！”大家顿时欢呼、鼓掌、拥抱，然后喝酒，互相祝贺。这是我永记在心的场面呀！总指挥叫我快睡觉去。他知道我们自来到草原，很少睡个好觉。谁知我躺下来反而阖不上眼，太激动了，可是不知不觉睡了我一生也忘不了的一个觉。我睡觉从来都有梦，但这个觉竟然没梦，一个“真空”的觉，好像整整睡了一个世纪。多少个日日夜夜积下的辛劳，一次成功就一扫而光。

这样，我们就动手搞正式的核试验了。六四年七、八月最热的天气里，我们带着全套测试仪器到达戈壁滩。无边无涯的戈壁滩上，太阳晒得看不见一滴水，鸟儿也热得飞不起来，贴着地皮昏昏悠悠地打转。可是那里已经造起一座高高的铁塔，这就是第一个核试验塔。我们在铁塔上安装仪器，又在距离铁塔不远的测试工号里装仪器，中间用一根根电缆相连。一旦核爆炸，电缆就断了，塔上的仪器就要全部炸毁，全部最有价值的数据都保留在测试工号的仪器里，万一仪器出故障，核爆炸的重要数据就全丢了，那将是极其重大的损失。天大的责任压在我们肩上。测试工号大半截在地下，又有坚固的水泥墙保护，炸不坏的。可白天里边奇热，夜里冰冷。睡觉？我们只在临时搭起的帐篷里打个盹儿，接着干。那些天，我们真是把“自己是谁”都忘了。自己就是仪器，就是原子弹吧！

我们基地总指挥也来到核试验场。这位总指挥原先是位将军，身材魁梧，他原先对原子技术并不懂，但领导有方，很有大将风度。他参加过西藏解放，人非常好，很体贴大伙，刚到金银滩时，他和我们同住在草原上的帐篷里，后来造了房子但还不够，就叫我们先搬进去，他依旧住在帐篷里。他说你们这些人应该住在好地方，和现在很多领导真是两样了。十月十五日，一切安装好，开始撤离。我们撤退到几十公里以外没有辐射的地方，我们的将军是最后一个撤离的。因为还要有专门的人爬到塔上插雷管。雷管是反复检查过的，万一失手就会大祸临头，插好后还要仔细检查。那时已经不能用电，电梯停了，只能爬上去。总指挥和其他几位领导一直在塔下盯着这些最后的程序。我当晚在几十公里外打电话给总指挥，他还在塔下接我电话呢。那时，整个队伍由上到下就是这种素质。

我们等着中央的命令。参试人员聚集在安全地带，朝着铁塔方向看。看不见塔影，只有空旷的大地和无穷的蓝天，我们一切希望也都寄托给这无比宁静的天地之间了。

北京的命令下来，点火！10，9，8，7，6，5，4，3，2，1，直到0。怎么还不见动？一瞬间，紧张得心蹦上来，卡在喉咙里：失败了？若是一败，说不定就要从头干起。正想着，刹那间一朵无比巨大的、鲜花一样的大蘑菇云升天而起。原来我们离得太远，“零时”的闪光没注意到，但我们终于看到这朵苦苦期待的蘑菇云向蓝天翻涌而起。我们喊呀，叫呀，跳呀，叫得嗓子哑了。有人忘乎所以，跳得一屁股摔在地上，起来再跳。我笑得哭了，直抹泪。那时泪也是甜的……这场面你肯定在电影或照片上看见过。第一颗原子弹成功了！给我们用自己双手干出来了！跟着是大庆祝，北京出了号外。如果你在现场，身在其中参加这工作，你也会体会它的来之不易，体会我们当时那种作为中国人强烈的自豪感。自豪不是虚张声势，自豪是自己干出来的。这朵在大西北升起的蘑菇云，是千千万万人赤胆忠心、成年累月、实实在在工作的结果。大家想的都是国家强盛，没人想到嫌钱发财，或为了升级、职称、住房，打破了头。我是亲身参加者，我接触到无数无名英雄，无论高技术工人、科研人员、组织者，还是那些从事找矿、开采、浓缩、提炼、加工、制造的人，都把青春年岁贡献给了这事业。还有防化兵们，他们必须在爆炸后冲进现场取回样品，供给我们研究爆炸效果。他们的防护服里装着多少斤汗水呀。这样，到了“文革”前，我们基地已经像一座小城镇了。百货公司、电影院、医院、学校、托儿所、银行等等应有尽有，事业真是充满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觉得还有许多大事要做。我是在这次核试验之前结婚的，爱人也来到基地，好像没经过什么选择，就把自己的一切，一生，全放在这儿了。

六六年突然间“文革”一来，就像在我们基地扔下了一颗意外的、人为的、政治的原子弹，全乱了。虽然这年十一月间我还在核试验场进行氢弹的原理试验，取得成功，转年氢弹又给我们搞出来，可氢弹的基础工作都是“文革”前搞的。

搞氢弹时，我还是近一百人研究室的主任，氢弹出来后我就受冲击了。有人问我搞原子弹试验的地方绝对保密，也搞“文革”吗？怎么不搞？当时不是说“有两个人的地方就有两派，就斗”吗？斗得一样凶。我们基地上也是两大派，原来的领导靠边站，新来的人支持一派打击一派，武斗打得更凶。六八年搞起清队，什么“事出有因”呀、“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呀、“共产党和国民党斗争的继续”呀、“清理阶级队伍，一定要抓紧”呀，有点家庭历史问题的人受罪了，像我这样没问题的也要想法弄出问题来。有人硬给我总结出“四个第一”，说我的“四个第一”是和林彪的“四个第一”相对抗。哪个第一针对哪个第一现在也记不准了。好像是说我用“业务第一”对抗林彪的“突出政治第一”，我严格抓试验质量是用“质量第一”对抗林彪的“政治思想工作第一”……我向来记不住这些话。先是要我低头接受大会批斗，接着就抄家，翻箱倒柜，受尽了辱骂和训斥。我想冲击这一阵子也就过去了吧。我家庭历史清楚，少年时期就参加地下党，说我“当权派”至多不过是个技术研究室负责人。不过一时靠边站，少说话或干脆不说话就会过去吧。我辛辛苦苦一心工作，能有我什么事？

没想到事出意外。一九六九年，这里很乱，大部份人闲着没事，写大字报，搞运动。总指挥他们都被揪出来，常挨斗。试验工作没人关心了，我在茫然中似乎等待运动快告一段落，好继续工作，可愈等愈没完。忽然上边说基地目标太大，不安全，搞内迁，东西全要装箱。这时候厂里很乱，许多人不上班，大概有的工人听说要搬迁，想趁机捞点小东西，弄点小油水，把分厂研究室里的一个书桌撬了，里边有本没用完的工作手册被偷去。一下子，祸从天降，有人向北京报告说基地丢失绝密材料。上边立即派了两个大人物来，一个是当时的公安部副部长，一个是海军的“首长”，还带来一帮人。这架势真是非同小可。他们一心想搞出个大案，把这里说成是“小台湾”，好震动全国，掀动大浪，否定过去的一切，来推动全国的“文革”运动。这两个人被称做“中央首长”，拿着尚方宝剑，说这工作手册是特务偷的，盗窃我国核试验机密情报，到处抓人，随便枪毙人，搞得一片恐怖，真吓人呀！逼供信，有人自杀了，这两位“中央首长”却把自杀说成他杀，说杀人的准是特

务，再抓杀人的特务，又抓特务后边的特务，抓了许多无辜的人。全体科研人员全给集中起来，搞互相揭发，乱成一团。这时火车也开不进来了，大草原仿佛回到远古野蛮厮杀的时代。

我们研究室抓出一个人。说他小时候去过香港，还有个亲戚在香港。为什么他从香港回国呢？好，这就抓住了，从香港派来偷窃情报的特务！二位“中央首长”带来一大帮人，给他编一套特务联系办法，暗号，逼他供认，还把他夫妇分开逼供，逼他们乱咬。他受不住就乱咬了，咬了许多人，也咬了我。好，我就是特务的后台。“中央首长”亲自在万人大会上点我是“大鲨鱼”，非要揪出大鲨鱼不行！这样，我就被关起来，恰好关在过去的实验室里，我自己成了实验品！解放军在门外看守，门上挖个小洞监视我。嘿，我倒像个原子弹，绝密品，严密看管。开始我还想，我从小参加革命，算个“老革命”，搞过原子弹，总理还接见过我呢。但“文革”就是过去的一切都不算，现在说你是什么就是什么。许多开国元勋都成了阶下囚，一个臭知识分子算什么？

后来特务愈抓愈多，实验室里关满了人。白天一人一个很矮的小板凳，坐在上边读语录，不准动。然后就想自己的“问题”，交待，提审，互相不准说话，夜里直到两点才许睡一小会儿，但不许关灯，怕自杀。可我这人不会瞎编，更不会咬别人，审来审去什么也交待不出来。我不知谁是“特务”。他们就骂我死硬，等着我的只有“死路一条”。给我最大刺激就是没多久一次枪毙人的万人大会了。

这天，“中央首长”召开万人大会，说要枪毙一批人。记得有一个是医生，是基地的外科大夫，他给一个解放军做手术时动坏了，平时最多算个医疗事故，可当时却是不得了的大事。他出身资产阶级，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柱石，这叫做阶级报复呀！有血债，要枪毙。还有个大学生，工资低，这人思想素质差些，发牢骚说怪话，说：“再不给我提工资，我就把雷管炸了。”给人揭发，这可是货真价实的特务，要搞破坏。虽然只是背地一句怪话，也不可能去做，但这怪话在当时逼得很难逼出来的，立刻成了罪行最严重的现行反革命，枪毙！

这天会场四周架起机枪，恐怖之极，群众都很紧张，因为说群众中还隐藏不少特务，有许多特嫌分子，谁知谁会被拉出枪毙。我想多半我今天真是“死路一条”了。我至今不敢想当时的感觉，也很难清晰描述那感觉，大概由于面临死亡，大脑一片混乱。只听会上一个个宣布罪行，执行枪决，我仿佛只等着他们叫喊我的名字了。那个外科医生，说怪话的大学生，都给拉到万人大会不远的地方当场枪毙了。枪声听得很清楚，没有轮到我……枪声过后，他们围起我来，对我说：“听见枪声了吗？”我说：“听见了。”他们说：“再不老实，第二天就是你！”跟着就对我展开一场声势浩大猛烈的批斗。

虽然他们没有枪毙我，但这件事给我很深的创痛。我这人活着，可是我心中很多东西被击碎了。子弹从我的命运旁侧擦过，我不可能不思考我以前从来没有深思过的问题。

此后很长一段时期这里依然处在大恐怖中，还在抓特务，又抓“五一六”。有人逃亡，想到北京上告，但周围的草原是没边的，逃到哪里去？他们开车四处追捕，抓回来就要死去活来地打。有一个复员军人给打得忍无可忍，操起铲子拼了，当然拼掉的只是他自己。特务愈抓愈多，我就不那么重点了。新抓的总是一时的重点，总更有搞头。没事时，我就用脑子想想技术问题，这时事业已经一片渺茫，但一有时间，脑子就爱在自己感兴趣的技术里转一转，这也许是知识分子的一种习惯，一种惯性，也许潜意识里我对事业还没有完全死心。此外，我惦记的唯有爱人，她在哪儿，做什么，我一点也不知道她的情况。我想到她在担心我，那才是难过极了。后来，基地搬家，就被押上一节运煤的货车上，和别的“特务”一起运到山沟里。

。在那与世隔绝的地方，继续过了一段挨整的日子。

直到林彪事件出来后，糊里糊涂就没事了。我回到北京，家里人都奇怪，怎么这样就回来了？互相望望，恍如隔世。惊讶失措之后，自然有说不完的话说。以后北京的一个科研部门调我，我答应了。从此我就和遥远的基地，和那些酸甜苦辣的生活，那些光荣与苦痛的日子全都告别了。别以为我是因为太伤心、太失望才离开那里的。那里给我的，并非太少而是太多。我多么想回到当年为国家轰轰烈烈干一番的那岁月里去。但如今那岁月的一切都已过去，它只保留在我的记忆里了。我珍惜，也惋惜它。我只能说——如果世界上还有比原子弹更厉害的东西，那就是“文化大革命”！

想为国家干点事，大概是每个中国知识分子的愿望，但因干事而遭难，便是中国知识分子都感受到的不幸。可是，背着这痛苦，仍然想干事，到底是不是我们的优点呢？现在有人说这是我们的最宝贵之处，也有人说是我们的最可悲之处。哪个说法更对？我把这个问题留给你，你是作家，大概能作出正确的回答。

回想我们基地那些科研人员，各自走过不同的艰辛历程。当然有很少数人，在运动里专门整人，口号喊得最响亮，当过毛泽东思想标兵，一时飞黄腾达，后来的命运也未必美妙。很多人遭遇比我更惨，有的被逼死或逼疯。有一个科学家，整天被“支左”的人围在院子里，逼着他像牲口一样跑，一边跑一边喊“坦自从宽，抗拒从严，顽抗到底，死路一条”。我呢，在这场大风暴里幸免生还，问心无愧就是了。我没有伤害过任何人，心里平静。过去做过一点好事，对得起祖国和人民，现在仍抱定宗旨，正直为人，扎实做事。尽管“文革”中创痛犹在，我能把它妥当埋藏心底。无论国家交给我做什么，我还是要努力做好。只要国家招呼一声。

□ 选自《一百个人的十年》

~~~~~

【研究报告】 or go to [the end of this last column](#) or [back to TOC](#)

## 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连载之十八）

• 宋永毅 • 孙大进 •

### 第九章 上海新思潮：在炮打张春桥的背后（续）

紧急动员，揪出大叛徒、野心家、阴谋家张春桥

时候到了！法庭开了！现在是把大叛徒、大野心家、反革命两面派张春桥揪出来的时候了。

有人不是说，“张春桥是坚定的革命左派，要誓死保卫”吗？

就是这样一个坚定的“革命左派”在柯老（柯庆施，曾任中共华东局及上海市主要领导——编者按）逝世以后伙同上海的走资派陈、曹、杨（陈丕显、曹荻秋、杨西光，文革开始时的上海市领导人——编者按）把上海搞成针插不落，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

就是他伙同陈、曹、杨扼杀上海人民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

一月革命以来，张春桥的反革命两面派手法越来越明显，沿着反革命道路越走越远，就是他，处处和我们伟大领袖相提并论，分庭抗礼，就是他，肆无忌惮的捏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也就是他把上海一千万人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领导下取得的伟大成绩据为己有，在上海大树特树个人权威。

就是他，大反坚定的革命左派许世友，破坏中国人民解放军，破坏军内的文化大革命，也就是他在上海拉一派打一派，破坏革命大联合，“三结合”。

还是他，背着中央自搞一套和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相对抗。

总之，张春桥是个大坏蛋，庆父不死，鲁难未已，罪魁祸首，决无宁日，象这样一个大坏蛋，就是要把他打倒！有人说，你们是反对上海市革委会，否，我们说，揪出张春桥上海不会乱。

我们要提醒上海市革委会的同志，上海市无产阶级革命派要时刻听毛主席的声音，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不要让张春桥引上邪路上去。毛主席教导我们，阶级敌人是一定要寻找机会表现他们自己的，他们对于亡国共产是不甘心的，从一月革命以来，反对上海市革委会的逆流一天也没有停止过，他们时而极左，时而极右，从各方面来动摇新生的红色政权，赤卫队、红卫军异党臭联司，资产阶级的反动政客，反革命东方学会，反复辟学会，复旦的变色龙，胡守钧和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是不甘心灭亡的，还有人会跳出来否定反逆流大方向。为此，我们必须提高警惕，这些臭类，胆敢妄动，坚决镇压。毛主席最新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继续。”

全市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紧急动员起来，行动起来，揪出张春桥，为保卫毛主席而战，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一旦把他们消灭乾净，鲜红的太阳普照全球，举起你的双手吧，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新上海将更加威武雄壮。

复旦大学 新闻系《立新功》（1968年4月18日）

∞ ∞ ∞ ∞ ∞ ∞ ∞ ∞ ∞ ∞

反复辟学会创立宣言（草案）

全世界进入了以毛泽东思想为伟大旗帜的新时代！

我们的时代是以中国为代表的革命营垒和以美帝苏修为代表的反动营垒短兵相接。将经历一场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最激烈、最艰苦、最复杂、最变化多端的最后斗争局面的新时代！

这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派亲手埋葬美帝、踏平苏修、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惊心动魄的时代！

这是我们创造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新世界，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人仰马翻的如火如荼的时代！

这是历史大踏步前进。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出现了马克思所预言的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欣欣向荣的时代！

这是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胸怀坦白的、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光辉灿烂的时代！

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什么问题最大？

现代的中国，是世界矛盾的焦点，是世界革命风暴的中心，是世界上起决定作用的国家，在中国如何反对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最大！

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什么问题是关键？

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是改造人们灵魂的马列主义，是无产阶级最强大的思想武器，大立伟大的光焰无际、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是关键！

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顶峰就是顶峰，就是水平最高、威信最大、威力最猛，就是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毛泽东思想把马列主义推进到第三个里程碑，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崭新阶段里，决不允许也绝不可能有第二个所谓“顶峰”。不懂得这一点，就不是一个清醒的马列主义者！我们的时代，谁否认毛泽东思想，就从根本上否定了马列主义，正如列宁时代否认列宁主义就从根本上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发展下去就是犯历史性错误，堕落为千古罪人，就要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全世界共伐之！

德国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学得最好的是俄国，不是德国；

俄国出了列宁主义，学得最好的是中国，不是俄国；

中国出了毛泽东思想，我们怎么办？

林彪同志是毛主席最优秀、最杰出、最坚定的学生，他对毛泽东思想学得最好，领会最深，是我们时代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典范。他一贯最忠实、最坚决、最彻底地执行和捍卫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我们一定要以林彪同志为榜样，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忠实执行毛泽东思想，积极宣传毛泽东思想，勇敢捍卫毛泽东思想，理解了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中国是毛泽东思想的故乡，它是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时代的伟大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明灯，它将永远成为放射毛泽东思想灿烂光辉的革命圣地！

时机到了！

世界大潮卷得更急了！

神通广大的历史锅炉全部沸腾起来了！

如何学习毛泽东思想？如何运用毛泽东思想？如何传播毛泽东思想？这是反对和防止人头滚滚落地的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的迫切任务，这是决定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兴旺发达的头等大事，这是世界革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一句话，这是世界范围内实现共产主义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

无产阶级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政权问题一直是革命的根本问题，就是无产阶级已经取得政权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是如此。

中国向何处去？是不是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关系到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大问题，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来说：再没有也不可能有比中国红色政权的崩溃有更大的打击了。不管是从我们的观点出发，或者是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观点出发，以鲜血和生命保卫毛泽东思想的故乡——中国，是高于一切、重于一切、压倒一切的战斗任务，正如恩维尔·霍查同志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说的那

样：“支持人民中国，保卫它免受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修正主义者的侵犯，是一切革命的和爱好自由的力量和人民的历史性任务和生命攸关的问题。”

八月五日，毛主席发表了光辉的马列主义文献《炮打司令部》一周年，正好也是我们复旦大学《反复辟》战斗组成立一周年，哪里出现资本主义复辟，我们就在那里反复辟，在和资产阶级司令部浴血奋战的艰苦岁月里，我们和广大工农群众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知识分子若不和工农群众相结合，其思想往往是动摇的，容易接受或右或“左”的反动思潮，也是青年运动拉向右转的根本原因。我们一定要把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坚决遵循毛主席指引的青年运动的方向，走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康庄大道。

反复辟学会就这样诞生了！

二十五年前，毛主席明确指出：“按照中国运动的丰富内容来说，理论战线就非常之不相称，两者比较起来，理论方面就显得非常之落后。”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高峡雷霆之势，如暴风骤雨，起源于北京，席卷全中国，震撼全世界，顺它的生，逆它的亡！

中国社会产生了空前的阶级大变动的最新动态，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急剧变化，伟大的革命实践如此精彩，如此丰富，如此生动！中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其现状带有普遍性的意义，研究了错综复杂的中国问题，等于解决了世界问题的关键，研究中国是研究世界的捷径。我们的时代，谁不了解中国，要了解世界是一句空话，不首先注意研究中国，所谓研究世界问题，一定会犯方向、路线错误，研究现状必须以中国为主！毛主席历来最关心、最重视、最强调中国问题，对中国的国情做了最大量的、最深刻的、最严密的科学研究，形成了一整套最高水平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这笔最宝贵的马列主义财富，我们还只是感觉到了的东西，并不理解，“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能更深刻地感觉它。”如果有人借口搞运动，拒绝对这些问题做认真的仔细的研究，正如毛主席所说：“那他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只有善于应用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运用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大革命的学说，一边搞运动，一边搞理论，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做出合乎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需要的理论性创造，才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根本意义所在。我们能用毛泽东思想科学地说明一二个实际问题，就算有了几分成绩，说明的东西越多，越普遍，越深刻，我们的成绩也就越大。如果我们身为革命造反派，不以全部精力投入运动，对于中国最高水平的朝气蓬勃的现状熟视无睹，一无所知，只能背用经典著作中的个别结论和个别原理，那么，我们在理论战线上的成绩未免太坏了，有愧于“毛泽东思想故乡”神圣而光荣的称号！

我们既是革命的动力又是革命的对象，一定要把破私立公的思想革命化提高到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我们的实践证明：进行客观世界的反复辟，如果不同时进行主观世界的反复辟，不跳出“私”字的局限性，不从“我”字中解放出来，所谓理论研究是搞不好的，其理论也一定是不彻底的，伟大的无产阶级反复辟事业必将导致失败！

一切服从于前线的战斗，组织任务必须服从于政治任务，利用业余时间，交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经验，交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有利于本单位的斗批改，一句话，有利于共同学习、运用和传播毛泽东思想，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把革命的大批判进行到底！成立反复辟学会，我们认为是绝对必要的，反复辟学会是由红卫兵小将发起的，热烈欢迎有热气有抱负的广大工农群众，革命干部和革

命师生等造反派参加，尤其欢迎加着狂妄称号的“狂妄人”参加，他们应当是无限热爱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的，无限忠于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的，具有冲天革命干劲和相当研究能力的。本学会要求每一个成员充份发挥革命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深刻意识到自己是“革命的主体”。我们来自五湖四海，为了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走到一起来了！

中国是我们的！

世界是我们的！

全世界毛泽东思想化的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大刮无产阶级强劲的东风，十级、十一级、十二级……，以“横扫千军如卷席”之势，坚决、彻底、乾净、全部地，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试看未来的环球，必将是光辉无际、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哗啦啦飘扬的新世界！

我们正在前进。

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

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无限的希望，无限的前程，无限的光明，光辉灿烂的共产主义锦绣前程就在前面！

反复辟学会 一九六七年八月五日

∞ ∞ ∞ ∞ ∞ ∞ ∞ ∞ ∞ ∞

中串会：一切为了九大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正是人类历史上一个最伟大的转折点，这个转折，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是有解放全世界的莫大意义。在这急剧转变的陡峭关头，资本主义的旧制度将如山崩地裂般倒塌下来，同时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就将如雨后春笋似的出现。

这将是一幅多么振奋人心的壮丽图景。这将是世界无产阶级最盛大的节日。

在这伟大的转变中，东方巨人——红色中国担任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角。伟大导师毛主席是驾驭整个历史进程的最高统帅。

历史的车轮推进了今天，世界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阶级，经过长期酝酿和反复较量，即将进行一场大决战。它必然带来世界上阶级矛盾的集中爆发，带来一场空前规模的急风暴雨。在世界革命根据地中国所进行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进行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殊死搏斗的现实，已经开始吹响了这场世界决战的进军号，揭开了这场大决战极其激动人心的序幕。

伟大舵手毛主席在决战前夕意味深长的激励我们：“大风大浪也不可怕，人类社会就是从大风大浪中发展起来的。”

惊人的豪迈气魄，空前的鼓舞人心。



在世界革命大风暴即将来临的重大时刻，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中国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毛主席的世界革命伟大战略部署的重大组成部份，这是整顿和巩固世界革命根据地以利于在整个决战中立于不败之地的一个果断英明的战略措施。

在世界革命大风暴即将来临的重大时刻，伟大领袖毛主席率领着以雷霆万钧之势呼啸前进的中国英雄铁军，迎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有着伟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九大，将关系到祖国的前途和命运。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再一次的交锋，仍是极为激烈的。党权是政权的核心，是阶级斗争焦点的焦点。敌人不甘心死亡，正在焦急的拼凑残余力量，妄图在九大上反攻倒算。

九大，也将直接影响着世界决战的成败。关键的中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这条被毛主席所阐明的重要历史定律，在两条路线斗争越来越深刻地反映到我们队伍里来的今天，在九大召开的关键时刻，可以澄清许多游离政权斗争的糊涂观念，丢掉不少敌情观点淡漠的和平幻想。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在何时何地何种情况下，都会以新的形式不断再现，在整个斗争中，尤其在关键时刻，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当前，在九大召开的前夕，摆在我们面前的伟大任务是：以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为纲，从思想上、组织上整顿革命的阶级队伍，彻底批判中国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建党路线，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向着走资派和资本主义势力继续进行猛烈的进攻，把无产阶级革命派夺得的政权，在党内用组织形式巩固下来。

为了完成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我们必须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与错误的思想作不疲倦的斗争，尽力克服小资产阶级的摇摆性，坚决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陈伯达同志指出：“在地主资产阶级和国际资本势力还在天天梦想恢复他们天堂的这样时期内，小资产阶级还会不断生长出新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摇摆性是很严重的。地主资产阶级总是想通过小资产阶级的摇摆性，……来篡夺我们的文化、思想、文艺的阵地，为他们实行反革命复辟的活动，制造便利。”这条规律，在文化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刻），表现得更为明显。

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进行革命时，小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显著特征就表现为：注意力不是主要集中在革命的主要对象——走资派。一有风吹草动，就会把斗争矛头主要地指向革命的一般对象，甚至自己的战友，自觉或不自觉地起到掩护走资派的作用。

在九大召开的前夕，在争夺党权的关键时刻，小资产阶级革命派们再也忍耐不住，破门而出，迫不及待地抛出了一连串的东西。

#### ◇ 中国社会的变动

在清理阶级队伍问题上，我们和小资产阶级革命派发生了严重的分歧。

这种分歧首先表现在阶级关系变化的问题上。由于对阶级关系变化这一重大的理论问题各有不同的看法，因而对革命的主要对象和依靠对象，对于如何进行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也各自采取不同的态度。

我们应当很好地分析阶级关系的变化，彻底摧毁小资产阶级革命派在阶级队伍问题上的理论基础，为我们夺好党权、迎接九大作好舆论准备。

“十七年来我国的阶级阵线基本上稳定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派是这么说的。

毛主席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指出：“我们现在是处在一个社会大变动的时期。中国社会很久以来就处在大变动中间了。抗日战争时期是大变动，解放战争时期也是大变动，但是就性质说来，现在的变动比过去的变动深刻得多。”“全国各个阶级的相互关系都在起变化。”“这样的大变动当然要反映到人们的思想上来。存在决定意识。在不同的阶级、阶层、社会集团的人们中间，对于这个社会制度的大变动，有各种不同的反应。”

在以上几段论述中，毛主席结合1957年以及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状况，阐明了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给予我们抨击小资产阶级革命派在阶级关系问题上散布的腐朽神话以强大的理论武器。

革命，就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举动，就是阶级关系突变的表现，就是阶级斗争白热化的爆发点。社会大变动，社会大革命，是由于长期阶级斗争而引起它们之间关系发生变化的结晶。文化大革命的阶级关系的变化，比起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至任何一次革命都要来得深刻。阶级斗争的最重要阵地已经转移到意识形态领域里。阶级斗争的成败不仅表现在政治上，不仅表现在政治上某一阶级的胜利或消灭。更为突出的，是表现在意识形态领域里谁对谁实行专政的问题，这已经成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谁胜谁负的关键所在。“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最顽固的维护者和最集中的代表者走资派与广大人民之间的矛盾已经上升到主要地位了。这一基本事实，对于阶级关系的变化起了决定性的影响。不断铲除这些渣滓，引起阶级关系不断的变动，引起了革命队伍中依靠对象、团结对象、争取对象以及清洗对象的不断变动，引起政权的相应变化，这就构成了无产阶级专政下不断发展的阶级斗争史的主要内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受到了致命的打击，小资产阶级革命派得到了深刻的改造和剧烈的分化，这些就构成了阶级关系的变化。

正如列宁所讲的：“任何革命，只要是真正的革命，归根结底，是阶级变动。因此提高群众觉悟的最好方法，揭露用革命誓言欺骗群众的行为的最好方法，就是分析这些革命中发生了和正在发生怎样的阶级变动。”锋利的词句直刺小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心窝，剖开来一看，全是谎言的污水，哪有一点血！

诚然，小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真正用意是回避了一些部门一些单位资本主义复辟的触目惊心的事实，掩盖了资产阶级司令部十七年来猖狂向毛主席革命路线反攻倒算的罪行。我们倒要问它们，解放前几千年来的阶级阵线是否是基本稳定呢？他们没有说，大概还没有这么蠢，回答起来一定是否定的，那么，解放前一直是剥削阶级掌权，工农兵一直是受压迫的，掌权阶级没有变，被压迫者也没有变，阶级阵线怎么会变起来呢？请看，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蒋介石由某一段时间的统战对象变为革命的主要对象，这就是阶级阵线大变动的重要标志。同样，从解放战争到文化大革命，党内机会主义者同人民的矛盾由次要上升为主要的矛盾，为革命的主要对象，并因此而引起的革命阵线内部的依靠、团结、清洗对象的变动，这就构成了阶级阵线的大变动。由此可见，阶级阵线变化与否并不决定于掌权阶级变化与否。

杨得志同志说：有些人“看不惯造反派”，“看不到阶级阵线已经变了，老工人、党团员分化了。结果死死地扭不过来。”

教育界的阶级关系的变化，集中体现在革命的主要对象的问题上。

“研究走资派主要的是依靠谁在教育界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再决定教育革命的主要对象是什么。”小资产阶级革命派一语道破了天机。原来教育界走资派本身尚不是教育革命的主要对象，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的主要对象的理论，在小资产阶级革命派们的眼里，已经不适用了，需要重新加以“研究”，然后再“决定”。人们万分惊讶，小资产阶级革命派们已经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了第四个里程碑。

研究结果如何呢？敬爱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派含蓄地透露了：教育战线上，“走资派依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我们进行资产阶级专政，这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在这里，这位革命派先生装起糊涂来了，把毛主席尖锐抨击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歪曲成是指具有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一般知识分子在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弦外之音自然是：这些知识分子就是革命的主要对象。兜了半天圈子，还是老一套。剥去保护色，就可以看到刻在他们身上烙印的显著特征：转移斗争大方向，掩护走资派。稍有一点教育革命常识的正常人们，就会清楚回答：毛主席这里讲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主要是指那些早已浸透了资产阶级灵魂的最典型最反动最顽固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对无产阶级的专政，是指他们十七年来的反革命统治。离开了阶级斗争的基本事实，离开了阶级大变动的新特点，离开了政权问题上斗争的新动向，来咬文嚼字，来玩弄概念，是最低劣不过的手法了。某些天真的同志，会觉得很奇怪：小资产阶级革命派们专门喜欢揪斗地富反坏右以及具有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一般知识分子，疾恶如仇，阶级感情不是很深厚吗？岂但是深厚，还极真挚呢！我们实在惊叹“阶级斗争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这话的确凿性，你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有几分抵触情绪，就会表现几分，自己的言行就是内心世界的绝妙写照，一分一毫也不差。漂亮的言词，慷慨的姿态，也无法掩饰自己在阶级斗争大风浪中的真实举动。

#### ◇ 政权问题

最初，我们看到前十条里毛主席写下的这么一段话，“这一场斗争是重新教育人的斗争，是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向着正在向我们猖狂进攻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作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把它们的反革命气焰压下去，把这些势力中的绝大多数人改造成为新人的伟大的运动”，觉得很理解。在这里，毛主席深刻地全面阐明了每次重大革命的客观规律，阐明了在革命中阶级关系变动的必然和实质。这条规律，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得到了生动的体现。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再到反右斗争，直到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开端，这场文化大革命，天地间发生了无穷的变化，很根本的一个变化，就是阶级队伍随着革命的深入而改变了。

在资产阶级专政的教育界里，走资派们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对无产阶级实行专政，心怀叵测地混淆黑白，搅乱甚至颠倒了阶级关系。被走资派所发现和组织的十七年来的“左派队伍”，并非完全是真的，在文化大革命的疾风暴雨中，已经暴露出其中有一些是右派，为数众多的是中间派。

毛主席也发现和组织了一批左派队伍，这就是在大风大浪中成长起来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涌现的新生骨干力量。出于对教育界基本状况估计的不同，也就得出依靠不同对象的结论。两种不同的政治观点，在依靠对象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小资产阶级革命派们把文化大革命说成是一场悲剧，是历史利用了造反派，在他们的眼里看来，造反派都是群痞子，“只不过是历史的长河中划了几桨而已”。“造反派只能打天下，不能坐天下”，“真正掌权的还得靠十七年来的真正的革命派，真正的老左派”。他们在这套所谓的“理论”的武装下，就向我们毫不客气的伸

手了。其实，他们还是比较蹩脚的，他们这套理论也只不过是拾人牙慧而已。他们的鼻祖刘少奇、安子文早在1947年绥远土改时就发明了这套理论，什么“土改一开始积极斗争土豪劣绅的都是地主二流子，以后起来的才是真正的贫雇农”。何其相似乃尔！简直就是一根琴弦上弹出来的调。可敬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派先生们，难道我们今天还用得着多大的精力去批判刘少奇的陈词滥调吗？

资产阶级专政的教育界往往会出现这样一个怪现象：非党员要比党员好，非干部会比干部好。走资派排斥了大量优秀的革命分子。越是基层，越是受到黑线影响小的同志，比较接近生活，比较尊重客观，尊重真理，也就比较能接受毛泽东思想。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教育界里，党员队伍严重不纯。关键在于政权，在于教育界被资产阶级专了政。不是这样的思考问题和提出问题，不是从这个角度来分析种种现象，就一点也触动不了教育界走资派的一根毫毛，就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教育界的问题，教育革命只不过是酣梦中的空想而已。

林副统帅在总结复辟和反复辟经验时指出：“这种复辟的危险是综合的，国内国外，国内是主要的，党内党外，党内是主要的，上层下层，上层是主要的。”

他们的种种言行，都是反对我们抓住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主要危险——走资派，转移视线，不把精力集中在从根本上结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的问题上，集中在砸烂旧的国家机器，砸烂走资派的旧班底上。

这种表面上回避政权问题，回避夺走资派的权这一要害问题的手法，这种不断把斗争引向脱离政权的邪路的手法，实际上，是为了建立一个改良主义甚至修正主义的领导班子服务的，是为小资产阶级以至资产阶级夺权的。

林副统帅指出：“政权的问题，归根结底就是一个班子的问题。”

砸烂旧班底，一方面要把走资派手中的权，把新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没有改造好的修正主义苗子手中的权统统夺过来；另一方面要肃清他们的错误思想，时时防止他们利用自己的影响以令人不觉察的方式进行反夺权。要对中国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建党路线和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谬论加以彻底批判。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教育界的走资派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以后，发现旧社会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已经不很得心应手了，加上名声又不好，他们本人的政历问题又太复杂。于是，就在青年干部中物色对象，其中有的成了修正主义的苗子，有的成了新的资产阶级分子。这是走资派里比较狡猾的角色下的种子，必须认真对付。那批修正主义苗子和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是走资派的极重要的工具。在夺权过程中，对于他们应当严加防备。经过文化大革命冲击，改好了的也可以依靠，仍在时时窥探方向，对造反派耿耿于怀者，就有可能成为窃取革命成果的政治扒手，继续为其主子效劳。正象张春桥同志指出的那样：“他们对造反派有看法，反对造反派。……看你们在这里开会就不舒服，进进出出都是这些人，他看着就不顺眼，……如不注意教育，这些人只要一有风吹草动，就可能经不住，到那时就有事了。两个司令部都有自己的人，都有自己的社会基础。”

砸烂旧班底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巩固新生红色政权的过程。清理阶级队伍，必须从领导班子着手，从巩固政权着眼，这就是无产阶级政治观。

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就是为着建立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导班子。

革命，从根本意义来讲，就是先进的思想战胜了落后的，反动的思想。社会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就是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实现。当然，要战胜旧的思想体系，必须借助于物质力量，在阶级社会里，得首先并且主要借助于政权的力量。非常强

大的无产阶级政权力量，推出了一个普及毛泽东思想的文化革命运动，同时，这个普及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运动，将大大加速历史的进程，大大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从这里可以看到，要巩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政权，必须与各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潮作不疲倦的斗争。

#### ◇ 整顿思想打倒派性

在当前，加强无产阶级党性，打倒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是树立无产阶级的阶级队伍的一个重要思想内容，并且是提高这支队伍战斗力的重大措施。为了召开九大，必须从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作准备。政治上我们把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彻底摧毁了，并在更深入地进行大批判；组织上，我们清理党的队伍、干部队伍、造反派队伍及教育界队伍；思想上我们就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去战胜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勇敢地同“私”字决裂，这样才能把我们的队伍建设成为一支具有高度革命性，科学性和组织纪律性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铁军。有了可靠队伍才能夺取最后胜利。能不能打倒派性，增强党性，就是能不能树起队伍的问题。所以，从根本上来说，进一步组织和教育我们的阶级队伍，这是夺好党权，迎接九大的伟大战略部署的极其重要的组成部份。

元旦社论尖锐地指出：“能不能自觉地克服派性，是在新形势下愿不愿意做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重要标志。”党性与派性的斗争，已成为新形势下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一种重要形式，成为文化革命中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如果再不自觉克服派性，就会自觉不自觉地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来顽固地反对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而终于被革命队伍所抛弃。

文化大革命发展至今，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在组织上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和经济上反革命经济主义进攻这软硬两手已经基本上失去了原先的“妙用”，他们采取了新形势下的反革命新策略。一月革命以后，无产阶级革命派占了优势，迫切需要进行进一步组织和教育自己的阶级队伍，来夺好权，掌好权，用好权。这时党内一小撮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社会上的阶级敌人，不甘心他们的灭亡，就千方百计利用无产阶级革命派内部的“私”字，拼命煽动派性，挑拨离间，制造分裂，挑起武斗，破坏革命大联合，分裂无产阶级革命派队伍，妄图扰乱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已成了当前他们向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手段，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这种反动思潮上政治舞台表演一番，是不奇怪的，有它的社会根源、思想根源。

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众多的国家。在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长期统治下，剥削阶级传统观念、利己主义，历千年之久，根深蒂固，在小资产者阶层里是颇有市场的。解放十八年，人们的精神面貌是在不断更新，但是余毒仍然是很深的。这不但是“反映旧制度的旧思想的残余，总是长期地留在人们的头脑里，不愿意轻易地退走的”缘故，更应该注意的是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是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最顽固的维护者和最集中的代表者。十几年来，他们把持着文化、宣传机器，不但不去触动剥削阶级四旧的一根毫毛，还大肆宣扬帝封资修的臭货，更恶毒的是象疯狗一样攻击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禁止毛泽东思想的传播，为了篡党篡政造舆论的反革命需要，他们篡夺了文化、教育界的领导权。所以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余毒是更深。

马克思说过：思想对社会的影响，原因与结果是互相替换的。

毛主席精辟地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和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的影响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作为阶级的意识形态，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这种阶级

斗争反映到党内，就产生了路线、政策的分歧，并最终两个司令部的斗争为最高形式。而资产阶级司令部里的走资派，又转过来扶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及理论和著作上的代表反动学术权威，及其社会基础地富反坏右分子。他们妄想通过他们的思想体系来蒙蔽、毒害更多的劳动人民，扰乱无产阶级的阶级阵线，扩大反革命阵线，达到资本主义复辟的目的。

林彪副统帅说：“旧的思想，是为旧的经济基础服务的，反映了反动阶级的要求，对社会的发展起着阻碍作用；新的思想，是为新的经济基础服务的，反映了先进阶级的要求，对社会发展起加速、促进的作用。”这就是先进思想影响与反动思想影响之间的本质差别。

反动的旧思想的阻碍作用，有时并不被人们所十分重视。当反动思潮控制、蒙蔽着一部份的人们，起着恶劣的阻碍社会发展作用的时候，那部份人们往往是毫不觉察的。人们常说：阶级斗争总是走曲折的道路。正是这样，每一曲折，就是先进思想与反动思想斗争的一个回合。

林彪同志说过：“在一个短时期，刘邓的这条路线是取得了一个差不多统治的地位。”这是一个例子。

去年八、九月份，“揪军内一小撮”的歪风，又是一个例子。

现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这种反动思潮影响了我们队伍中那么多人，已成为阶级敌人利用来向无产阶级进攻的手段，是更可说明的了。

我们必须以高度的警惕来注意反动思潮的阻碍作用，并用先进思想与之斗争。

我们应当清楚地看到：上海是资产阶级的集中地，阶级敌人是非常敏感，非常狡猾的，非常善于利用形势的变化来进行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反革命活动的。目前，围剿派性已形成了高潮。在高潮中，某些表面上隐下去的矛盾大有发展的趋势。某些政治扒手妄图用“围剿”“派性”的口号，来向造反派进行反扑，这是绝对不允许的。反对派性，首先应当把矛头指向走资派，应当时时从有利于无产阶级革命派夺好党权这个根本角度出发来进行斗争。为反对派性而反派性的斗争是没有的，都是围绕着政权问题而展开。要么助长保守势力抬头，要么提高革命队伍战斗力以便夺好权用好权，两者必居其一。在派性泛滥时，保守势力，反动势力也从未停止过对革命造反派的进攻。这是一条规律。因为派性斗争是大量的，主要的，就以此来完全否认路线斗争，包庇反动势力、保守势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扑，历史将会证明，这是错误的，历史上已经有过这种例子。在去年十月份以后，或者因为借口反对极“左”思潮，或者因为诚心反对极“左”思潮而没有注意到阶级斗争的复杂性，犯了迎合保守势力打击造反派的严重错误。历史在新的条件下，还会重演一遍。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阶级斗争规律。问题在于善于学习，吸取教训。总是有些人老是喜欢被动，在紧要关头老是犯错误，老是需要别人在他的背上猛击一掌，才清醒过来。哪一个年头能使这些人自己认清道路，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呢？有一个好法子，就是深入阶级斗争实际，注意政治斗争的新动向，不要奴隶主义，不要右倾保守，要有造反派的思想感情，才能为造反派掌好权。否则，总有一天要淘汰的。

#### ◇ 结束语

伟大的统帅毛主席站在高山之巅，以惊人的气魄，挥动着巨掌，指出了浩浩荡荡的亿万工农群众的红色铁流唯一正确的方向，辽阔的战场上，战尘迷漫鏖战急，鼓角悲壮，马蹄声咽。新的战斗，更加惊心动魄，更加空前规模的战斗展现在我们

面前。

历史在迅速发展，革命在飞跃前进。我们正处在伟大时代的转折点上。“一天等于二十年”，这一科学预言，在今天，在两条路线深刻反映到人们灵魂深处的重大时刻，在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九大即将来临之际，显示出神奇的作用。时间是多么宝贵呵！现在我们顽强地奋斗，坚持不懈的努力，待到二三十年之后，待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一月风暴席卷全世界时，可以清楚地看到，显得极为要紧，极为关键！

有志气有抱负的年青一代，在决定命运的政治搏斗中，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激烈斗争中，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失去的只是精神枷锁，革命的铁扫帚将扫荡一切污泥浊水。

原载上海《红卫战报》（中串会影印版）

□ 引自上海市上海中学《思潮集》（1968年）

（第九章完 待续：第十章 李一哲：迈向民主最沉实的一步）

---

Now go to [the previous Zeng Kan issue](#)  
or go back to [the TOC of this issue](#)  
or go to [the next Zeng Kan issue](#)  
or go to [the index of all available issues](#)  
or go to [the end of this last column](#)

---

|             |           |                                                                |
|-------------|-----------|----------------------------------------------------------------|
| 本期责任编辑：     | 华新民（美国）   | <a href="mailto:cnd-cm@cnd.org">&lt;cnd-cm@cnd.org&gt;</a>     |
| 本期 校对：      | 赵 桦（美国）   | <a href="mailto:cnd-cm@cnd.org">&lt;cnd-cm@cnd.org&gt;</a>     |
| 读者技术咨询：     | 荣 刚（美国）   | <a href="mailto:cnd-help@cnd.org">&lt;cnd-help@cnd.org&gt;</a> |
| 网络技术支持：     | 李健民（澳大利亚） | <a href="mailto:cnd-info@cnd.org">&lt;cnd-info@cnd.org&gt;</a> |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赵 桦（美国）   | <a href="mailto:cnd-cm@cnd.org">&lt;cnd-cm@cnd.org&gt;</a>     |
|             | 吕 青（加拿大）  | <a href="mailto:cnd-cm@cnd.org">&lt;cnd-cm@cnd.org&gt;</a>     |
| 《华夏文摘》主编：   | 李彤彬（美国）   | <a href="mailto:cnd-cm@cnd.org">&lt;cnd-cm@cnd.org&gt;</a>     |
| 《CND》总编：    | 熊 波（美国）   | <a href="mailto:cnd-cm@cnd.org">&lt;cnd-cm@cnd.org&gt;</a>     |

---

如需获取关于订阅或停订《华夏文摘》（GB，HZ或GB—UU编码版）以及CND提供的其它免费服务的详细步骤和有关信息，请致信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HXWZ/>

《华夏文摘》FTP服务站地址：[ftp.cnd.org](ftp://cnd.org)[207.151.78.100]: pub/hxwz

[canada.cnd.org](ftp://cnd.org)[142.132.1.13]: pub/cnd/  
hxwz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

HTML version rendered by WL, XT and GC